

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

陈东辉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 他们之间的“恩”是主要的, “怨”是次要和局部的。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 对他的学问给予高度的评价。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 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 他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 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的重要功绩, 但也不能因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阮元; 段玉裁; 清代学术史; 乾嘉学派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3-0121-09

阮元(1764—1849)是清代中后期号称“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元老”的封疆大吏, 同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师鸿儒, 系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学界领袖的地位。因此, 他与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交往甚多, 经常通过当面交谈、书信往来等方式切磋学术。其中段玉裁(1735—1815)就是与阮元交往较多的一位学者。他们之间有恩有怨, 其中的一些奥妙, 还鲜有人探究。笔者从事阮元及清代学术史研究多年, 想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阮元与段玉裁之关系

阮元与段玉裁同为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 并且均精通小学。阮元在经学、史学、哲学、训诂、文字、金石、书画、校勘、历算、舆地、文学等领域都卓有建树, 尤以训诂、考据之学见长, 成为乾嘉学派的后起之秀和扬州学派的中坚人物。段玉裁乃杰出的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和经学家, 他所撰的《说文解字注》是公认的代表清代“说文学”最高水平的传世不朽之著作。从师承上看, 段玉裁和王念孙同受业于戴震, 而阮元早年师从王念孙研习小学, 应该说有渊源关系。此外, 段玉裁的故乡金坛虽然属于镇江府, 但与阮元的故乡扬州很近, 仅一江之隔, 同时, 段氏年轻时还曾肄业于扬州安定书院, 与扬州有着特殊的关系, 故赵航所著的《扬州学派新论》(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1年)和《扬州学派概论》(广陵书社, 2003年)均将段玉裁列入扬州学派的主要成员, 与王念孙、阮元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

段玉裁比阮元年长29岁, 应该说阮元对段玉裁这位长辈是很尊敬和信任的, 对他的学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阮元在《汉读考周礼六卷序》中有云:“金坛段若膺先生于其间, 研摩经籍, 甄综百氏, 聪可以辨牛铢, 舌可以别淄、澠, 巧可以分风擘流, 其书有功于天下后世者, 可得而言也。其言古

音也,别支、佳为一,脂、微、齐、皆、灰为一,之、为一,职、德者,之之入,术、物、迄、月、没、曷、末、黠、辖、薛者,脂之入,陌、麦、昔、锡者,支之入,自唐、虞至陈、隋,有韵之文,无不印合,而歌、麻近支,文、元、寒、删近脂,尤、幽近之,古音今音,皆可得其条贯。此先生之功一也。其言《说文》也,谓《说文》五百四十部,次第以形相联,每部之中,次第以义相属,每字之下,兼说其古义、古形、古音。训释者,古义也,像某形、从某某声者,古形也,云某声,云读若某者,古音也。三者合而一,篆乃完也。其引经传,有引以说古义者,以转注、假借分观之,如《尚书》曰‘至于岱宗,柴’。《诗》曰‘祝祭于祊’。《说文》之本义也,如《尚书》曰‘无有作’。《周书》曰‘布重蔑席’。说假借此字之义也。有引以说古形者,如《易》曰‘百谷草木丽于地’。说从草丽之意,《易》曰‘丰其屋’。说从一丰之意,《易》曰‘突如其来如’。说从倒子之意,《易》曰‘先庚三日’。说庸从庚之意是也。有引以说古音者,如‘读若《诗》施古澹澹’。‘读若子违汝’是也。学者以其说求之,斯《说文》无不可通之处。《说文》无不可通之处,斯经传无不可通之处矣。此先生之功二也。至若《汉读考》叙例谓:‘读如主于说音,读为主于更字说义,当为主于纠正误字。如者比方之词,为者变化之词,当为者纠正之词。读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经之本字。读为必易其字,故下文乃用所易之字。’《说文》者,说字之书,故有读如,无读为。说经传之书,则必兼是二者。自先生此言出,学者凡读汉儒经、子、《汉书》之注,如梦得觉,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摘埴。此先生之功三也。盖先生于语言文字剖析如是,则于经传之大义,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1] pp. 241-242)当然,与古今中外的众多序文一样,也不排除内中有溢美之成分。但阮元同样也看到段氏著作中的不足之处。他曾指出:‘金坛段懋堂大令,通古今之训诂,明声读之是非,先成《十七部音均表》,又著《说文解字注》十四篇,可谓文字之指归,肆经之津筏矣。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况书成之时,年已七十,精力就衰,不能改正,而校讎之事,又属之门下士,往往不参检本书,未免有误。’^[2]应该说阮元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阮元在主持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聘请了段玉裁、顾广圻等著名学者参加,并对段氏委以重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实行分任纂辑,由李尚之任《周易》、《谷梁》、《孟子》部分的纂辑,臧在东任《周礼》、《公羊》、《尔雅》部分的纂辑,严厚民任《左传》、《孝经》部分的纂辑,徐心田任《尚书》、《仪礼》部分的纂辑,洪堂任《礼记》部分的纂辑,孙雨人任《论语》部分的纂辑,顾广圻任《毛诗》部分的纂辑,而由段氏总其成。关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由段氏总其成,刘盼遂在《段玉裁先生年谱》已及之,但是说得还不十分肯定,云“阮氏《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或出先生手定”。汪绍楹承其说,并明确指出“段氏主其事无疑”^[3]。笔者认为,“由段氏总其成”的提法更为确切一些。

从段玉裁的角度而言,他与阮元的关系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否则他也不会去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更不会为该书作序,也不会对阮元的文章提出修改建议。嘉庆十一年(1806)冬,阮元将自己撰写的父母《行状》寄呈段氏,段氏仔细阅读后提出修改意见三条^[4]。段氏曾云:‘数年以来文章而兼通财之友,惟藉阮公一人。’^[5]这句话说明了段、阮交往是较多的,段对阮的总体印象还是好的,并且阮元还给过段玉裁经济上的帮助。此外,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今文经学家龚自珍(1792—1841)乃段玉裁之外孙,与阮元结成忘年交。阮元对龚氏这位比自己小28岁的晚辈赏识有加,而龚自珍对阮元也非常敬重。道光三年(1823),阮氏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时,龚氏为了庆祝阮氏60大寿,在京城专门撰写了《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以彰显其“任道多,积德厚,履位高,成名众”之事迹。阮、龚之忘年交,固然主要是因为双方情投意合,但也有昔年阮、段交情之因素。顺便说一句,龚氏之性格在某些方面与段氏颇有相近之处,他才气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有时连对自己的外祖父也瞧不起。上海图书馆所藏龚自珍手批的《说文解字注》,内中龚氏许多地方不以为然,有时甚至讥笑怒骂^[6] (p. 503)。

二、段玉裁对阮元不满之事由

段玉裁对阮元的最大不满在于,段氏认为自己在参加《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编写工作时,扮演了“为人作嫁衣”的角色。嘉庆九年(1804),段氏曾在致王念孙的函中对此事流露出明显的不满。他在函中云:“弟七十余耳,乃昏眊如八九十者,不能读书。惟恨前此之年,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时拙著不能成矣。所谓一个错也。”^①根据段氏的生平资料,书信中所说的“为人作嫁衣”之事,当指他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过程中,承担了实际负责人的工作,为主编阮元“作嫁衣”,而“拙著”是指《说文解字注》。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事确实耽误了《说文解字注》的撰稿工作。刘盼遂所编的《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收有段氏《与刘端临第二十九书》。他于书信中提到:“弟衰迈之至。《说文》(按:指《说文解字注》)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书请王伯申踵完。伯申杳无回书。今年一年《说文》仅成三页。故虽阮公盛意而辞不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证》,自顾精力万万不能。近日亦荐顾千里、徐心田养原两君而辞之。”^②由此可见,当时《说文解字注》的撰写进度甚慢,业已年迈体衰的段玉裁心急如焚。笔者认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事耽误了《说文解字注》的撰稿工作是事实。但《说文解字注》撰写进度缓慢,并非仅是《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事引起的。我们注意到,早在段氏参与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前,嘉庆四年(1799),他在《与刘端临第十七书》中略云:“故近来宿食不宁,两目昏花,心源枯槁。深惜《说文》之难成。”^③他又在嘉庆六年(1801)《与刘端临第二十六书》中略云:“弟贱体春病如故,栗栗危惧,望有以教之。《说文注》恐难成。意欲请王伯申终其事。”^④可见,当时段氏已深感力不从心,所以即使后来段氏未参与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说文解字注》也不可能很快完成。事实上《说文解字注》直至嘉庆十二年(1807)方全部完成。另外,段玉裁曾于嘉庆九年(1804)委托阮元刊刻他所著的《说文解字注》。阮元刻成《说文解字注》一卷后^⑤,因丁父艰解职,未能再刻其余各卷,使段氏十分失望,又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段氏对阮氏的不满,并成为段氏迁怒于阮氏的导火线。严元照《悔庵学文》卷一中有上段玉裁书,谏其与某公重大矛盾事。现引述如下:“前于尊案见所寄某公书稿,词气激直。大致似欧阳公与高司谏之书。欧公之所论者,国事之是非。然后之君子,于欧公不能无疑议。今先生之所争,较之欧公,其大小何如,而凌厉挥斥,令人无所措手足。《传》有之,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受之者岂遂能甘?此尊意若曰,彼虽不甘,吾何惧之有?夫惧不惧,亦何足深论。且非惧险要也,惧失儒者谨厚之风耳。更就此事论之,在先生始亦失之轻信。夫既身据要津,欲为朋好刊行著述。固非艰大难胜之事也。苟非力所能积,则竟寝其事,有何不可。而乃委曲踌躇,募助集事。其始也如此,又奚怪有今日之事乎。然则先生之责之也,又已甚矣。人之知此事之颠末者,不能不谓先生处之失其平。不知者传闻失实,不过曰,段先生因某公不为刻书,荐书院,骂之耳。如此则先生之品诣亦少损矣……先生不以鄙意为非,则乞润色元稿,微词缓调,使之自悟焉可矣……天寒欲雪,呵冻临池。不妨学宋广平之赋梅花,慎勿效嵇叔夜作《绝交》书也。”^⑥根据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缘由,这当指段氏因阮元未刻完《说文解字注》之事而大怒,于是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严元照采用“微词缓调”之方式,极力劝谏段玉裁对信件原稿加以

① 刘盼遂将此札定为嘉庆七年(1802)所作,但该年顾氏已与《十三经》局中人纷争不断,且与段氏亦已生嫌隙,段氏似未必会再荐顾氏。《顾千里研究》李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一书中的《新订顾千里年谱》将此札系于嘉庆六年(1801)。

② 乾隆六十年(1795)冬,段氏在《与刘端临第十二书》中略云:“弟之说文,亦写刻本二卷。嘱江良亨篆书。剞劂之工,大约定于明冬。”(转引自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收于《刘盼遂文集》第414页)嘉庆十一年(1806)冬,段氏致王念孙书中提到:“《说文解字注》尚有未成者二卷也(十二之下十三之下)。今冬明春必欲完之。已刻者仅三卷耳。精力衰甚,能成而死则幸矣。”(罗振玉编《昭代经师手简》)。可见在阮氏刊刻之前,《说文解字注》业已刻成二卷。

修改。就现有的史料看,段氏此札最终是否发出不得而知,但从中可明显地看出段氏情绪激昂,对阮元意见很大。刘盼遂所撰的《段玉裁先生年谱》在引用上述文字后有如下按语:“札中所称某公者殆谓萧山王昶(绍兰)也。嘉庆五年十二月,先生与刘端临书云,有经术吏治之王绍兰官闽中,已升知州,许为刻《说文》,当先刻数本。是王氏许为刻书而卒未实行。迨后王氏著《说文段注订补》,深诋先生是书。其凶终隙末,有可概见者。然先生之倔强负气,以言词笔札致嫉者,亦毕呈于此札。故录存之。”^{[8] p.423}笔者认为,刘氏之论断缺乏足够的证据,值得商榷。札中所称“某公”并非王绍兰,而应当是指阮元,主要理由有三:一是王绍兰当时虽然已是“知州”,但还称不上“身据要津”,而阮元则符合。二是王绍兰虽未兑现自己“许为刻《说文》”之诺言,但并无义务一定要为段氏刻书。段氏与王氏既无深交,也未曾替王氏“作嫁衣”。根据一般逻辑,段氏不可能对王氏如此怨恨。三是严元照的上段玉裁书作于嘉庆九年(1804)冬,与嘉庆九年(1804)夏段氏在《致王念孙书》中提及“为人作嫁衣”之事在时间上很接近,而王氏“许为刻《说文》”已是嘉庆五年(1800)以前之事,隔了整整五年。此外,刘氏“按语”中所谓的“迨后王氏著《说文段注订补》,深诋先生是书”,极易使人误解成为王氏“深诋《说文解字注》”,故而段氏勃然大怒,其实并非如此。因为《说文段注订补》著于嘉庆年间,虽然具体成书年月已难以考定,但肯定比段氏作此札的时间晚。最后,退一步说,即使依刘氏之说,也可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段氏之性格。再者,刘氏所说的《说文段注订补》“深诋先生是书”,亦欠妥当。笔者认为胡朴安的评价较为公允:“王氏之订补,其例有二:订者订段之讹,补者补段之略。视徐氏钮氏之书,更为丰富而畅达,而持论之平实,过于钮氏……为读段注者所不可不读之书。”^{[9] pp.315-316}

三、段玉裁对阮元不满之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阮元在学术领域的一个重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是最大贡献)是主持编纂、刻印了几部著名的大型书籍。嘉庆初年,阮元组织编纂了《经籍纂诂》,他亲自拟定了《经籍纂诂》的24条凡例,然后由何兰汀、朱为弼等33人担任分纂,负责分头摘抄有关古籍中的注释性文字。分纂工作完成后,阮元又延请擅长训诂之学的臧镛堂及其弟臧礼堂任总纂,再由宋咸熙等五人承担分韵工作,洪颐煊等十人完成编韵任务。此外,总校由方起谦和何元锡担任,收掌由汤燧和宋咸熙担任,复校由臧镛堂和臧礼堂完成,刊板复校则由林慰曾充其役。阮元专门在卷首详细列出了上述人员的姓名,以示此乃集体编纂之成果,阮氏个人并无掠美之意。《皇清经解》为阮氏任两广总督时,组织人力在他创立的广州学海堂中所辑刻,由诂经精舍培养的高才生严杰任总编辑,吴兰修为监刻,学海堂诸生充任校对,孙成彦管理复校,阮元之子阮福则在署总理收发书籍、催督刻工诸事。严杰等人以及捐资刊书者李秉绶、李秉文均在《皇清经解》卷首显著位置列名。《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做法亦大体相仿。只是有一点阮元考虑欠周,就是既然段玉裁实际上承担了“总其成”的工作,那么也应该像任命臧镛堂、严杰一样任命他为“总纂”。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所担当的职责,与臧镛堂在编纂《经籍纂诂》时所担当的职责和严杰在编纂《皇清经解》时所担当的职责有相似之处。如果按照目前出版的一些大型书籍和学术刊物的署名方式,阮元相当于“主编”,臧镛堂、严杰、段玉裁相当于“执行主编”。“执行主编”所做的具体工作往往要比“主编”多不少,这确实是事实。“主编”确实有挂名的,但也有名副其实的,不能一概而论。在编纂上述三部大书时,作为主编的阮元在制定体例、学术指导、遴选人员、物质支持诸方面贡献甚大。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各经“校勘记”卷首,均冠有阮元所撰之序。序文简明扼要,学术性很强,论述了各经版本情况以及各家注疏之得失等,显示出阮元的学识。同时,序中还专门说明了各经“校勘记”系委托何人分撰而成,以尊重他人的劳动。此外,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内也有阮元亲自撰写的校勘记,如《仪礼注疏》卷三二中

的“下言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谓亲自服其私亲也。”这段文字的校勘记，当为阮元亲笔。就是根据今天的标准来看，阮元也是基本遵守学术规范的。像《经籍蠡诂》之类的大型书籍，如果没有阮元这样的高官兼大学者主持编纂或大力支持，单靠某一位或某几位学者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关于这一点，清代大学者章学诚心中也非常明白，故章氏曾在嘉庆二年（1797）正月上书朱珪，请其代谋于当时的浙江巡抚谢启昆和浙江学政阮元，欲借他们之力来编纂《史籍考》。可见，由有地位的学者出面组织编纂大书，是当时的一种通行做法，为广大学者及整个社会所认可。并且，有阮元这样经历过从学者到高官的人，在为官后仍念念不忘学问，同时还积极倡导学术研究，热心于编书、校书、刻书和印书事业，古今中外还是为数不多的，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尚小明曾作过详细的论述^[10]（pp.126-137）。此外，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的第三章《江南学者的职业化》第三节《官方与半官方赞助》中，亦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其中第三部分的题目即为《阮元的学术赞助》^[11]（pp.77-79）。再如，嘉庆四年（1799）段氏在《与刘端临第十七书》中略云：“故近来宿食不宁，两目昏花，心源枯竭。深惜《说文》之难成。《仪礼疏》已校出，何由足下得见也。意欲延一后生能读书者，相助完《说文》稿子，而不可得。在东已赴广东为芸台刊《经籍蠡诂》，千里亦无暇助我。归后再图之。”^[8]（p.418）可见，段氏在撰写《说文解字注》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也很希望“延一后生能读书者”协助他实现自己的心愿。那么，为何同样是在阮元主编之书书中担负“执行主编”之重任，臧镛堂和严杰都没有什么意见，而惟独段玉裁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很大呢？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再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认为除了阮氏未任命段氏为“总纂”外，尚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段玉裁过于自信，自视极高，在阮元面前亦有所流露。后人对段玉裁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经学等方面的成就评价甚高，但段玉裁将自己估计得还要高。如他曾说：“玉裁昔年深究古文辞之旨，惟端临知我耳。”^[4]又在《与刘端临第十七书》中略云：“弟于学问深有所见……吾辈数人死后，将来虽有刻《十三经》者，恐不能精矣。”^[8]（p.418）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在清代学者中，从段玉裁的一生来看，他属于比较骄傲的一人，他恃才傲物，对人少所赞许。江有诰乃段玉裁之后学，对段氏恭敬有加，但段氏于江氏则颇为傲慢。段玉裁曾说：“足下音韵功深，古学疏浅，当以多读书为务，即此一字，可得考古之法。”^[12]此外，段玉裁与顾广圻曾为校勘原则等事发生过异常激烈的争论，后来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两人绝交。此乃清代学术史上人所皆知之公案，诚如张舜徽所言《经韵楼集》卷十一、十二所载与顾千里讨论学制诸书，争“西学”、“四学”一字之差，连篇累牍，至于毒骂丑诋，有如悍妇之斗口舌。以七十余岁老翁，不惜与后生较短长，角胜负，至于如此，亦未免盛气凌人矣！^[13]（p.227）张氏还说：“以余观二人意气之争，段氏实不能辞其咎。”^[13]（p.345）段氏在嘉庆十一年（1806）四月初二致王念孙的函中云：“弟落魄无似，时观理学之书。《说文注》近日可成，乞为作一序。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领望之。”^[5]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固然不符合事实，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段氏的人际关系不佳，当时许多人对他心存不满，这种不满应该主要源于段氏恃才傲物之性格。《清代学人录》中说：“段玉裁有着良好的学风，他对师长很尊重，虚心好学，对于后学他又能诲人不倦。”^[14]（p.146）对这一评价，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当然，段氏始终对其业师戴震非常尊敬，执弟子礼甚恭，就是到了年老之时，每当提及戴震之名，必垂手拱立，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还要庄重地吟诵业师之手札一通，但有时不免为尊者讳，甚至不惜曲为之说。并且，人的性格往往具有两面性，段氏确实有对戴震尊敬的一面，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掩盖其常常好强逞博、负气争胜的另一面。后人将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的学术并称为“段王之学”，其实他们在性格和治学风格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就总体而言，王氏父子较为平实、谦和，段氏则较为武断、气盛。段玉裁也许认为像他这样的“一流人才”，白白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为人作嫁衣”，导致自己的“一流著作”《说文解字注》耽搁数年，心里越想越不平衡，于是不平则鸣。

并且,段氏可能认为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难度较编纂《经籍蠡诂》为大,他的贡献应该比臧镛堂大,况且他还没有臧镛堂那样的“总纂”名义,这更引起了他的不满。

其次,段玉裁认为,凭阮元的地位和能力,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替自己刊刻整部《说文解字注》。段氏非常希望《说文解字注》这部凝聚着自己大半生心血的代表性著作能够早日面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阮元仅仅刻成了一卷,这对于视学术如生命(清代学者大多如此)的段玉裁来说,打击太大了,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于是反应相当强烈。虽然他知道阮元未能刻完自有其客观原因,但也不予谅解。段玉裁肯定清楚在其委托阮元刊刻《说文解字注》之前,阮氏已经刻印了钱大昕的《三统术衍》三卷、孔广森的《仪郑堂文集》二卷、彭元瑞的《石经考文提要》十卷、胡廷森的《西琴诗草》一卷、张惠言的《周易虞氏易》九卷和《周易虞氏消息》二卷等当时的学者著作,并且都是整部刻完的,为何阮元只为他刻印了一卷?他实在想不通!更重要的是,段玉裁认为,他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为阮元出了大力,而阮元此次却没有尽力帮他,实在不够朋友,因而耿耿于怀。同时应该说明的是,段氏之言有些属于气头上的话,有借题发挥和夸张的成分,不可仅仅据此判断是非,而应该同时结合其他文献数据来作分析。段玉裁在《十三经注疏并释文校勘记序》中有云:“臣玉裁窃见臣阮元,自诸生时至今校误有年,病有明南北雍及琴川毛氏《十三经注疏》本纰缪百出。今年巡抚浙中,复取在馆时奉敕校《石经仪礼》之例,衡之群经,又广搜江东故家所储各善本,集诸名士,授简诂经精舍,令详其异同,抄撮会萃之,而以官事之暇,篝灯燃烛,定其是非。复以家居读礼数年,卒业于郑氏三礼,条分缕析,犁然悉当,成此巨编。”可见,段氏在这篇序中充分肯定了阮元在主持编纂《十三经注疏》及其《校勘记》时的功绩。当然,我们同样不能仅仅根据这篇序来判断阮元与段玉裁在编纂该书时的贡献孰大孰小。再者,笔者认为阮元当时之所以未能刻完《说文解字注》,后来也一直没有再补刻其余各卷或重刻全书^①,除了上文提及的原因之外,还另有该书卷帙较多(30卷,约110万字^②),刊刻费用较高之因素。阮元一生中虽然刻印了清代多位学者的著述,但一般篇幅都不太长。此外,段氏所流露的不满,也会多多少少导致阮元心中些许的不快,这恐怕也是阮氏后来未再补刻其余各卷或重刻全书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不会是主要原因。

再者,段玉裁在内心有些看不上阮元,认为他的学问不如自己。在清代学者中,段玉裁是“发明派”,而阮元属于“纂集派”。“发明派”有时不太瞧得起“纂集派”,这在清儒和近现代人的论述中均有不少反映,此不赘言。段氏曾云:“《经籍蠡诂》一书甚善,乃学者之邓林也。但如一屋散钱,未上串^{③[15]},拙著《说文注》成,正此书之钱串也。^{④[16]}再加上段玉裁自视极高,而他仅做过被称为“七品芝麻官”的贵州玉屏等县的知县而已。虽然段氏未必一定想当高官,但这种地位的显著差距也容易引起段氏对阮氏的不满。况且,段玉裁比阮元大出近三十岁,是阮元的长辈,在论资排辈、年长为尊的中国传统社会氛围中,以段氏之性格,内心是很难服膺阮元的。在阮、段交往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段玉裁对阮元的学问及其著述很少加以评论。笔者认为,段氏的上述心理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其实,阮元与段玉裁在学术上各有千秋。如果一定要作比较、分高下,那么,笔者认

①《说文解字注》直至嘉庆二十年(1815)方由段氏筹资全部刊成,此即经韵楼原刻本。段氏总算在去世前四个月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②笔者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经韵楼原刻本统计,不含《六书音均表》。

③笔者并不同意段氏的这一观点。事实上,《经籍蠡诂》从总体而言,虽属述而不作之书,但绝非材料的简单堆积。该书在义训的排列顺序上,反映了编者对古代汉语词义系统的整理和理解,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此前的字书所不及。我国古代经籍及其传注卷帙浩繁,搜集材料甚为不易,而汉语之同名异实或同实异名的现象又十分复杂,考辨疑义,求其意蕴,编次先后,难度尤大。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撼”字条下,因前人训释无定说,歧义纷出,莫可适从,尝慨叹不已:“盖训诂之难如此!”然而,《经籍蠡诂》的编纂者遵循该书凡例之规定,对纷繁的古训作了尽可能系统的整理,在训义的先后次第排列上,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为阮元在学问的广博与识见的阔通方面超过段玉裁,而段玉裁因为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等传世之作,表明他在文字学、音韵学等领域的研究比阮元深入。大家知道,阮元精通天算学,然而“在乾嘉时期就具体学者而论,他们中有半数以上的考据学家如惠栋、沈彤、卢文弨、王昶、朱筠、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江声、余萧客、洪亮吉、孙星衍、臧庸等人,对天算学有的粗知皮毛,有的根本就不涉此学,对西学接触更少^[17] p.51”。此外,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那样,阮元应属清代第一流的训诂学家,并且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不亚于段、王^[18] p.9)。这从阮元的文集——《揅经室集》就可以看出来。诚如张舜徽先生所云:“从来学者们谈到清代训诂学方面的成就时,莫不称举高邮王氏父子和栖霞郝懿行,很少有人提到阮元。这是由于阮元一生做过大官,他的学术成就,完全为名位所掩,不容易使人注意。加以他在训诂学方面,没有像王念孙著《广雅疏证》,郝懿行著《尔雅义疏》,从事一部书的精深研究,以专门名家,难怪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但他自己却承认在训诂学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6] p.448)本文之所以花费很大篇幅引用阮元《汉读考周礼六卷序》中的有关文字,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阮元在小学领域的良好素养。当然,阮元长期为官确实影响了治学,阮元堂弟阮亨的一段话较好地概括了阮元入官前后治学特点之不同。现引述如下:“兄早岁治文章,尤揅经义,尝手校《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岁撰《车制图解》,有为江(永)、戴(震)诸先生所未发者。此外如《封禅》、《明堂》、《一贯论》、《仁渐》、《浙乐奏》、《释旦》诸篇,皆独契往古,发前人所未发。至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蠹诂》、《十三经经郭》、《畴人传》、《金石志》等书,篇帙浩繁,皆自起凡例,择友人、弟子分任之,而亲加朱墨改订甚多。自言入翰林后即直内廷,编定书画,校勘石经。旋督学管部领封疆,潜揅时少。故入官以后编纂之书校多,而沈精殚思、独发古谊之作为少,不能似经生时之专力矣。^[19]诚然,如果阮元不为官,确实难以编纂《经籍蠹诂》、《十三经注疏》及其《校勘记》、《皇清经解》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型书籍,但肯定会有较充裕的时间从事个人的学术研究,其个人专集——《揅经室集》的部头也会大得多。此外,阮元还亲手创建了著名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一代学风,孕育了一批又一批朴学大家,对清代中后期学术发展之影响甚大^[20] [21]。笔者认为,如果就学问及学术成果的含金量而言,阮、段均系一流大学者,在所有清代学者中都可排入前三十位,但具体孰前孰后很难排定,因为除了钱大昕、顾炎武、戴震似乎可以位居三甲之外,前三十位的其余学者难分伯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段玉裁并没有理由看不起阮元。

纵观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他们之间的“恩”(即友好交往)是主要的,“怨”(即不和谐之处)是次要和局部的。并且,此处的“怨”是指段玉裁对阮元的不满,而根据现存的史料,阮元对段氏并未流露出一丝不满,但阮元在未任命段氏为“总纂”这点上考虑欠周,对段氏有些不公平。同时,阮氏当时未能刻完《说文解字注》有其客观原因,段氏应该谅解,然而,阮氏事后应该尽量想办法加以弥补(凭阮元的能力和地位是可以办到的),但从现存的史料看,并没有什么补救事例,这对段氏也不公平。所以,换一个角度看,段氏对阮氏的不满也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与段玉裁相比,阮元同郝懿行、凌廷堪、王引之、臧镛堂、江藩等学者的关系更为融洽,更愿意与他们交往,对他们的帮助一般也较段氏为多。郝、凌等人对阮元也是十分感激。如阮元曾多次寄钱给郝懿行,在经济上对郝氏资助甚多。又如阮元在19岁即与凌廷堪相识,从此成为终身挚友。凌氏于55岁就过早去世了,阮元非常悲痛,后来他去凭吊凌墓时,写下了一首名为《过海州板浦吊凌次仲教授》之诗,内有“山海应依旧,斯人世已无”、“耐久真成友,成名定作儒^[1] p.924)这样感人的诗句,足见阮、凌之关系非同一般。这大概和段氏的性格与郝、凌等人不同有很大关系,因为恃才傲物之士的人际关系一般都不会怎么好。不过,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都难以完全避免的吧!

总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段玉裁在编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时实际担任“总纂”(“执行主编”)的重要功绩,但也不能因此而否认阮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更不能像个别人那样想当然地认为阮元乃封疆大吏,他的学术成果大多是凭借他人之力完成的。

[参 考 文 献]

- [1] 阮元. 揅经室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2] 阮元. 段氏说文注订[A]. 王绍兰. 段氏说文注订[Z]. 清道光四年(1824)刊本.
- [3] 汪绍楹. 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A]. 中华书局编辑部. 文史·第 3 辑[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25 - 60.
- [4] 段玉裁. 与阮芸台书[A]. 段玉裁. 经韵楼集·卷三[Z]. 清道光元年(1821)刊本.
- [5] 段玉裁. 致王念孙书三[A]. 罗振玉. 昭代经师手简[Z]. 1916 年石印本.
- [6] 张舜徽. 清儒学记[A]. 济南: 齐鲁书社, 1991.
- [7] 段玉裁. 致王念孙书一[A]. 罗振玉. 昭代经师手简[C]. 1916 年石印本.
- [8] 刘盼遂. 段玉裁先生年谱[Z]. 刘盼遂. 刘盼遂文集[C].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9] 胡朴安. 中国文字学史[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 [10] 尚小明.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11] [美] 艾尔曼(著), 赵刚(译). 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12] 段玉裁. 与江晋三说《说文》“牙”字[A]. 段玉裁. 经韵楼集·卷五[C]. 清道光元年(1821)刊本.
- [13] 张舜徽. 清人文集别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14] 李春光. 清代学人录[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 [15] 陈东辉. 论《经籍蠹诂》的编纂及其功过得失[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8 (1): 1 - 8.
- [16] 段玉裁. 与刘端临第二十四书[A]. 刘盼遂. 段王学五种·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C]. 北平: 来薰阁书店, 1936.
- [17] 漆永祥. 乾嘉考据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8] 陈东辉. 阮元与小学[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 [19] 阮亨. 瀛舟笔谈·卷七[M].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本.
- [20] 陈东辉. 阮元与学海堂[A]. 中华书局编辑部. 文史·第 41 辑[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297 - 302.
- [21] 陈东辉. 阮元创设诂经精舍考略[J]. 中国文化研究, 1997 (4): 49 - 52.

[责任编辑 江予新]

O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an Yuan and Duan Yucai

CHEN Dong-hui

(*Research Center for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 Subtlet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an Yuan and Duan Yucai have rarely been researched so far. Both proficient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logy, Ruan and Duan were famous scholars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that of Emperor Jiaqing) of the Qing Dynasty. Ruan, 29 years younger than Duan, had respect for and trust in Duan due to his eminent scholarship. Although generally Duan got on well with Ruan, his deepest dissatisfaction with Ruan, who failed to appoint Duan as the compiler-in-chief of The Collation of Commentaries to the Thirteen Classics, was what he di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llation was taken advantage of by Ruan. In addition, Duan was bitterly disappointed that Ruan only finished inscribing one of the many volumes of Notes on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 failure to complete the whole task Duan had entrusted to Ruan.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data and some analysis ,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re are three more causes for Duan 's grudge against Ruan . First , Duan remained self-important . Second , Duan believed that Ruan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complete inscribing all the volumes of Notes on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 Third , Duan believed that he was superior to Ruan in terms of scholarship . Giv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an and Ruan , the positive aspects constitute the primary and most important part , while the negative aspects are secondary and less . Duan 's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compiling The Collation as the real "compiler-in-chief" should be fully confirmed . At the same time , the important role Ruan played in doing the compiling shouldn 't be disregarded .

Key words : Ruan Yuan ; Duan Yucai ;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 the school of the Qian-Jia period

谈大学出版社的人才资源开发

当前 ,大学出版社正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只有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克服障碍、加快发展 ,才是大学出版社快速成长的必由之路。人才资源是大学出版社的最大优势 ,大学出版社因为依托于高等学府 ,它的人员组成的平均学历往往要高于出版业的平均水平。高学历的人员组成使大学出版社拥有了优质的人才队伍基础。良好的学校教育 ,特别是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教育 ,使出版社的编辑具有很好的学习能力、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对各种新事物的极大敏感性。同时 ,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队伍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专业齐全 ;二是许多编辑来自教学第一线 ,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三是他们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和敬业精神 ,责任感强。

尽管大学出版社具有上述人才资源优势 ,但大多数出版社却没有对这一资源进行良好的开发和管理 ,从而使得该优势无法显现。大学出版社的人才管理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一些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往往对“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认识不够明确 ,不重视用事业、感情和适当的待遇凝聚人才、留住人才和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 ,使一些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合理的发挥。(2)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里的一个附属单位 ,人员大多来自学校的各个教学及行政部门。当前 ,我国整个出版业都在讨论出版社企业制度改革的问题 ,但是许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在关注企业制度改革的同时 ,却忽略了对人员观念转换的教育 ,没有注重帮助编辑建立市场意识 ,许多大学出版社的人员依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出版形势及发展态势 ,面对竞争往往没有主动出击的意识。(3)虽然大学出版社人员的平均学历较高 ,但编辑出版专业出身的人却极少。出版社作为一个经营企业 ,可以说是一个多工种协同配合运营的整体 ,每个环节都需要专门人才。可是 ,在许多大学出版社里却存在着轻视编辑出版工作的现象。比如 ,有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甚至是领导 ,往往认为图书编辑工作很简单 ,谁都能做 ,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 ,完全忽略了编辑工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技能 ,从而使有些具有很高学历的编辑人员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4)虽然大学出版社人才云集 ,但由于缺乏良好的人才资源开发和管理机制 ,没有从企业的战略眼光来配置人员 ,再加上在大学环境里人们对岗位认识的一些偏差 ,造成高学历人员主要集中在编辑和行政管理部门 ,而营销、发行、出版、储运等其他部门人员的学历却偏低 ,造成人才堆积、浪费与人才贫乏并存。

“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是核心竞争力的竞争” ,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需要培育和打造的。对于已具有人才优势的大学出版社来说 ,打造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就是做好人才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

(1)建立团队与梯队 ,产生整体效益。在团队和梯队的形成过程中 ,要建立完善的人才选拔和激励标准 ,积极引入公开竞争机制 ,增加透明度 ,采用量化的测评技术及方法。在竞争机制上 ,要形成公正而强有力的选人、用人机制 ,鼓励职工结合自己的条件和兴趣及企业具体情况 ,以能力、效率优先原则 ,通过正当的制度化的竞争手段争取自己的理想岗位。

(2)建立行之有效的人员培训制度 ,加强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大学出版社应该重视人员的编辑出版专业培训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人员培训制度 ,使出版社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学习和实践而真正具备出版人的专业素质。

(3)树立现代出版意识 ,挖掘人才的创新能力。大学出版社在进行人才资源开发时 ,要注重树立人才队伍的现代出版意识 ,加强市场竞争意识 ,变“被动来稿加工”为“主动策划组稿” ,调动每个人的创新能力。

(4)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理念 ,努力创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在进行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时 ,要在营造企业文化上下工夫 ,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人才生存发展的企业文化环境 ,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解人才、关心人才的良好风气 ,用共同的企业目标打造企业的向心力和团队精神 ,将大家“拧成一股绳” ,发挥合力 ,将出版社的目标和方向转化为全社职工共同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5)加强制度创新 ,保持队伍的活力与朝气。大学出版社在人才资源管理方面要明确思路 ,一方面要形成以“人才开发为核心”的管理思路 ,另一方面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管理 ,进行制度创新 ,通过一定的管理制度和手段 ,使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樊晓燕)